

历史的观念译丛
Series of Ideas of History

12

历史上的各个时代

兰克史学文选之一



〔德〕利奥波德·冯·兰克 著

〔德〕斯特凡·约尔丹 耶尔恩·吕森 编

杨培英 译

*Über die Epochen der neueren
Geschichte*

Leopold von Ranke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世界历史名著丛书

WORLD HISTORY CLASSICS SERIES



历史上的各个时代

从远古至中世纪

【英】

赫伯特·巴特菲尔德 著

陈正华 译

2009年10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ISBN 7-5097-0740-0

定价：35.00元

历史的观念译丛

历史上的各个时代

兰克史学文选之一



〔德〕利奥波德·冯·兰克 著

〔德〕斯特凡·约尔丹 耶尔恩·吕森 编

杨培英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上的各个时代:兰克史学文选之一/(德)兰克著;(德)约尔丹,吕森编;杨培英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

(历史的观念译丛)

ISBN 978-7-301-16204-0

I. 历… II. ①兰…②约…③吕…④杨… III. 史学史-欧洲
IV. K0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22885 号

Über die Epochen der neueren Geschichte

by Leopold von Ranke

Introduction and editorial material

by Stefan Jordan and Jörn Rüsen

书 名:历史上的各个时代——兰克史学文选之一

著作责任者:[德]利奥波德·冯·兰克 著

[德]斯特凡·约尔丹 耶尔恩·吕森 编 杨培英 译

责任编辑:岳秀坤

封面设计:奇文云海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16204-0/K·0659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pkuswsz@yahoo.com.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5

印 刷 者: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 开本 14.25 印张 170 千字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2.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历史的观念译丛》总序

序一

在跨文化交流不断加强的当下,如影相随的是,我们面对着全球化时代的一种紧迫要求,即必须更好地理解文化差异及特殊性。由中外学者携手组织的这套丛书,将致力于把西方有关历史、历史编纂、元史学和历史哲学的话语带入中国历史文化的园地。

历史论题是人类生活中极其重要的元素。在历史中,人们形成并且反映了他们与其他人的认同感、归属感,以及与他者的差异。在归属感和差异的宽泛视界中来看待“世界诸文明”,人们才能够谈及“文化认同”。历史学家们的专业学术工作往往涉及并依赖于认同形成的文化过程。由于这种牵涉,无论历史学家是否意识到,政治都在他们的工作中起着重要作用。不管学术性的历史研究仅仅只是作为资政的工具,还是因其方法的合理性而有着特别功能,这都已经是公开的问题。

关于历史思维的学术地位的许多讨论,还有它对“客观性”或普遍有效性的执著,都与世界范围内现代化过程中的历史思维之发展联系在一起。在这一过程中,历史思维获得了学术学科或者说“科学”(Wissenschaft,采该词更宽泛的意义)的形式。历史学研究的传统,其自尊就在于,它声称与非专业历史学相比有着更高层

次的有效性。一般用的词就是“客观性”。与这种对客观性的执著相反,许多重要论述进入了历史学家的自我意识,这牵涉到他们与各自国家历史文化的相互关系。例如,后现代主义极力否认客观性这种主张,并且指出,尽管历史研究有其方法的合理性,而在历史研究之外的政治利益、语言假定和文化意义标准等等,历史的解释却对它们有一种根本的依赖。

在意识到了记忆的作用,并且意识到了非专业性因素在异彩纷呈的人类生活领域中表现过去的作用之后,发生在历史学内外的、有关历史思想以及它作为学术学科的形式讨论,就因这种新的意识而被扩大了。在人类生活的文化定向中,记忆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它似乎要取代历史在那些决定历史认同的行为中所处的核心位置。这样一种更迭是否会造成足够重要的后果,影响到历史在民族文化生活中的角色,这一点还悬而未决。只要记忆与“实际发生的”经验相关,历史就仍然是对集体记忆中这种经验因素的一种言说。

在反思历史思想与职业历史学家的工作时,这种视界的扩展因为如下事实而获得了额外的扩大和深化,即:人们为了理解现在、期盼未来而研究过去的方式存在着根本的文化差异;没有这样的洞见,就不可能正确地理解历史。既然认同关系到与他者的差异,而历史是呈现、反思和交流这种差异的领域,历史学家的工作就必然一直处在对付这种差异的张力之中。“文明的冲突”便是一个口号,它标明,通过回忆和历史形成的认同中存在着紧张因素。

既然认同不只是界定和奋争的事情,它同时还是理解和认知,为此,这双重因素在历史话语中都必须主题化。每一种认同都因识别出他者而存在,而各种认同或认同的文化概念之间的张力以至于斗争或冲突,都不得被理解为一种认知的要求。是什么使得他者出现差异呢?对此不理解,认知就不可能实现。这样,就必

须了解他者的差异中那些强有力的文化要素和过程。

进而,若缺少贯穿这种差异的可理解性原则,认知也不可能。就学术性话语的层面而言,在将历史认同主题化,使之成为差异的一个事例时,这些普遍的要素和维度与专业性历史思维的话语特征有着本质上的关联。

这就是本丛书的出发点,它想把西方世界人们理解、讨论、扩展、批判和利用历史的途径告诉汉语世界。

这套丛书可谓雄心勃勃,它试图展现西方历史话语的整个领域。在思考历史的西方人眼中,西方历史思想是什么?谁的观点成了有影响的观点?想象一种单一的西方历史思想类型,并以之与非西方的中国人或印度人的历史思想相比对,这相当容易。但更进一步,人们就会发现,西方并没有这样一种类型,即单一的“观念”、“概念”或者“根本”。相反,我们找到了一种话语,它呈现出各种不同概念、观点和实际作用之间错综分合的交流。这套丛书便展现了这种多样性和话语特征,当然,非西方世界也会有类似情形。

本丛书分为作者论著和主题文集两类出版。第一类选取该作者对历史话语而言有着重要地位的作品,第二类则选取历史话语中的一些中心主题。每一卷都有介绍该作者或主题的导论、文本注释和文献目录。

本丛书期待对历史学领域中在新的层次上并且是高质量的跨文化交流有所贡献。抱着这种呈现更广泛的意见、立场、论证、争执的雄心壮志,它希望成为跨文化交流中类似研究的范例,使不同文化彼此得到更好的理解。在跨文化交流与对话的领域内,就一种对文化差异彼此了解的新文化来说,这种理解是必要的。

耶尔恩·吕森

2006年5月于德国埃森

序二

近代以来,西方历史思想家为人类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思想资源。历史的观念经过一代代思想家的演绎,构成了多元的话语系统,而且,这个系统还随着思想家们不断的思考、表现而获得扩充。

我们往往通过书本了解思想家们对历史的看法,但对于读者自身而言,我们却不能只是从书本中去理解历史。事实上,我们就生活在历史中,这并不是说我们现在的经历将成为历史,而是指我们身边的每一处能够被言说、被体悟的事情,如果不能够获得历史解释,它都无法进入理性的思索之中。从历史中获取意义,获取人生在某个时刻具有的确定性和行动的立足点,这是试图了解历史的人所追求的。但这样一种能力对于个人而言并不是可遗传的或可积累的,每个人都不得不在自己的生活中重新发展它。思想家们对过去的理解与认识、对历史这个观念的思考,以及对与历史相关的一些问题的探询,这些都只为我们耕耘未来生活这块荒原提供各式各样的工具,却不提供秋收的果实。

系统地译介西方史学理论或历史哲学作品,一直是20世纪以来几代中国学者的梦想。这个梦想曾经深藏在何兆武先生年轻的头脑中,此后,他身体力行,译著丰卓,为拓展国人的历史思维付出了不懈的努力。如今,跨文化交流的加强,以及国内学术事业的繁荣,使得这一梦想更有可能变为现实。

本丛书有幸得到了德国学者耶尔恩·吕森教授的大力支持。吕森教授认为,加强跨文化交流有利于创造一种新的世界文化,现存诸种文化可以包含在其中,但它们了解彼此的差异,尊重彼此的习惯;平等交流使得我们可以跨越文化鸿沟,同时拓宽我们理解历史的文化限度。这也是中方编辑者的初衷之一。这样,中德双方

组织者表现出极大的热忱。从丛书框架、选题的设计,到约请编译者,乃至沟通版权,一项项艰巨的任务在数年来持续不断的交流与努力中逐渐得到落实。

丛书编者有着极大的雄心,希望以数十年的努力,将西方 18 世纪以来关于历史、历史编纂、元史学和历史哲学的重要文献渐次翻译,奉献给汉语世界。如果可能,这套丛书还将涉及非西方世界史学思想的文献。

显然,这套丛书的出版是一项跨文化交流的成果,同时也是一项民间的学术事业,在此,我们要对所有帮助这套丛书出版的编者、译者、出版者表示感谢。愿这样的努力,也能够得到读者的关注、批评与认可。

张文杰 陈 新

2006 年 5 月

编者导言

耶尔恩·吕森 斯特凡·约尔丹

如同有“历史学之父”美名的希腊最早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 大约在公元前484年生于爱琴海畔的哈利卡那苏斯城, 卒于公元前425年)一样, 利奥波德·冯·兰克(1795—1886)常常被称为近代德国“历史学之父”。对于兰克的这种评价, 一方面, 似乎有些过高, 因为德国早在18世纪下半叶就开始了历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专业化和科学化进程; 不过, 从另一方面来看, 德语地区确实没有哪位历史学家能够像兰克那样不仅对于自己国家而且对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学的形成产生过如此重大的影响。属于兰克学派的历史学家, 有乔治·韦茨(Georg Waitz, 1813—1886)、威廉·吉泽布雷希特(Wilhelm Giesebrecht, 1814—1889)、海因里希·冯·聚贝尔(Heinrich von Sybel, 1817—1895)和年轻的瑞士人詹姆斯·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 1818—1897)——他后来为艺术-文化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以及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 1834—1902)——他对于19世纪末期的英国历史学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以上提及的人物都是积极接受兰克思想的欧洲代表人物。乔治·班克罗夫特(George Bancroft, 1800—1891)则在美国传播了兰克思想; 兰克去世之后, 他的私人藏书也卖到了美国(纽约锡拉丘斯[Syracuse]大学)。直至今日, 当人们

进行所谓后现代化的国际性讨论特别是研究如何区别历史事实与历史撰述的时候,往往还要谈及兰克关于科学客观性(wissenschaftliche Objektivität)和个人无先入之见(persönliche Unvoreingenommenheit)的理想主张。

一 兰克其人

利奥波德·冯·兰克是历史学方面的非凡人物,他的出身特别是他早期的发展和成长过程在19世纪初期的大多数德国历史学家当中是很典型的。像他的大部分专业同行一样,兰克出生在一个新教(基督教)神学家的家庭里。有证据表明,他的祖先从17世纪中叶起就是曼斯费尔德(Mansfeld)(在图林根[Thüringen])伯爵领地的牧师。他的祖父约翰·海因里希·伊斯雷尔·兰克(Johann Heinrich Israel Ranke, 1719—1799)在翁施特鲁特河畔(Unstrut)的里特堡(Ritteburg)担任牧师。正统的虔信的家庭职业传统在兰克的父亲戈特罗布·伊斯雷尔·兰克(Gottlob Israel Ranke, 1762—1836)这一代中断了,他在翁施特鲁特河畔的维厄(Wiehe)开业当律师和法律顾问。他继承了母亲的一笔遗产,从而保障了一家人能过上舒适的中产阶层的生活。尽管兰克的名字利奥波德(Leopold)后面不再按照家庭传统继续加上旧约教名“伊斯雷尔”(Israel),而是加上了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最后一位皇帝的非圣经名字“弗朗茨”(Franz),但兰克一生都受到了他虔诚信仰基督教家庭的决定性影响。新教信仰和中产阶层出身形成了兰克早期乃至他毕生事业的重要特色。兰克从青年时期直至大学时期的作品,主题多为宗教问题,后期的著作比如《教皇史》(*Geschichte der Päpste*)和《宗教改革时期的德意志史》(*Deutsche Geschichte im Zeitalter der Reformation*)也是致力于

教会和宗教历史题材的。他其余的著作也反映出了明显的新教世界观。

1795年12月20日,利奥波德(弗朗茨)·兰克生于维厄。他是家中长子,下面有八个弟弟妹妹。父亲名叫戈特罗布·伊斯雷尔·兰克,母亲名叫弗里德里克(Friederike,1776—1836),她的父姓是勒米克(Lehmicke)。兰克小时候先是接受父亲的启蒙教育,1807年春天开始上多恩多夫(Donndorf)修道院的寄宿学校。1809年5月,转到了位于普福尔塔(Pforta)的一所很有名气的萨克森州贵族学校,在那里学习了全面的文科知识。1814年复活节,兰克文科中学毕业,之后获准在莱比锡(Leipzig)大学注册入学。他决心选择神学研究的道路。他的两个弟弟海因里希(Heinrich, 1798—1878)和恩斯特(Ernst, 1814—1888)也选择了同样的职业生涯。后来兰克的职业愿望发生了变化,因为他在学习福音新教神学和语文学的过程中深受他的大学老师戈特弗里德·赫尔曼(Gottfried Hermann, 1772—1838)和克里斯蒂安·丹尼尔·贝克(Christian Daniel Beck, 1754—1832)的影响。赫尔曼介绍兰克成为莱比锡语文学协会的成员,指导他学习并掌握了文献考证和注释等研究方法。赫尔曼主要研究的是修昔底德(Thukydides)的著作。后来兰克正是在他那里获得了博士学位。赫尔曼是德国“语言语文学”(Sprachphilologie)的独具风格的维护者,他所代表的语文学主张审慎地对文献进行注释。兰克的另一位老师贝克虽然没有那么大的名望,但在科学认知方面更为现代,他属于“内容语文学”(Sachphilologie)的代表。“内容语文学”的目的在于从历史前后关系上解释著作,而“语言语文学”强调的是对于历史知识的叙述。兰克在大学学习期间就对涉及史实和史料的文章颇为敏感,同时他十分强调对于这些文章进行考证和评注的必要性。除此而外,兰克从大量阅读中所获得的经验更增强了他对历史的兴趣。

巴尔托尔特·格奥尔格·尼布尔(Barthold Georg Niebuhr, 1776—1831)关于罗马史的讲稿于1811—1812年印成了两卷集,这两卷《罗马史》成了兰克对历史资料进行考证研究工作的楷模。另外,兰克还非常喜欢瓦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 1771—1832)的历史小说,特别是他于1814年出版的《威弗利》(Waverly)。从这里人们不难找到兰克著作极具叙述才能的根源。

1817年,兰克获得了博士学位,并在柏林通过了获取较高教师职位资格的国家考试。第二年,他取得了在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市一所高级文科中学教历史和古代语言的首席教师职位,同时开始撰写他的处女作《拉丁与条顿民族史(1494—1535)》(*Geschichten der romanischen und germanischen Völker von 1494 bis 1535*),该书于1824年11月出版。正是凭借这本书,兰克在1825年4月被任命为柏林大学历史学副教授。在普鲁士的首府柏林,兰克和拉埃尔·法恩哈根(Rahel Varnhagen, 1771—1833)的文学沙龙有了接触。1825年2月,拉埃尔·法恩哈根的丈夫卡尔·奥古斯特·法恩哈根·冯·恩瑟(Karl August Varnhagen von Ense, 1785—1858)在《施佩纳报》(*die Spenersche Zeitung*)上发表了一篇赞扬性的评论,从而引起了公众对于兰克著作的兴趣。在法恩哈根家里,兰克和普鲁士早期著名的知识分子们有了联系。他们当中有自然科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 1769—1859)、神学家和哲学家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 1768—1834)、雕刻家克里斯蒂安·劳赫(Christian Rauch, 1777—1857)和约翰·戈特弗里德·沙多(Johann Gottfried Schadow, 1764—1850)、建筑师卡尔·弗里德里希·申克尔(Karl Friedrich Schinkel, 1781—1841)以及作家贝蒂纳·冯·阿尔尼姆(Bettina von Arnim, 1785—1859)、路德维希·蒂克(Ludwig Tieck, 1773—1853)和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

ne, 1797—1856)。1827年,兰克出版了他的第二本书,题目是《诸侯和平民》(*Fürsten und Völker*)。在这本书里,兰克阐述了16、17世纪欧洲的国家制度。此书出版后不久,兰克得到了一笔普鲁士奖学金,于是1827年9月他在欧洲进行了一次研究工作性质的旅行。他相继访问了维也纳、威尼斯、佛罗伦萨和罗马。利用这次旅行的机会,兰克会见了许多有影响的学者,并进行了艺术史方面的研究,特别是访问了意大利的档案馆。在这些档案馆里,他搜集到了大量的原始档案资料,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被称之为“威尼斯报告”的各国驻意大利公使们为本国政府撰写的汇报,这些资料成了兰克后来撰写许多著作的原始依据。

1831年初,兰克返回柏林。不久,普鲁士政府聘请他担任《历史-政治杂志》(*Historisch-politische Zeitschrift*)的编辑工作。这份杂志是普鲁士政府针对1830年夏季在许多欧洲国家发生的动乱所做出的反应,政府企图利用这份杂志为普鲁士的国家政策作宣传。兰克在1831年11月接受了这一职务,总共负责编辑出版了5期杂志。该杂志由于办得不成功,在1836年宣告停刊。兰克之所以没有能够使这份杂志与他一样受到公众的广泛关注,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从兰克的工作方法来看,他更适合做学者而不是当记者。对此兰克有自知之明,早在1831年他就曾经表露过对于杂志编辑工作的担忧。其次,他的文章多集中于历史题材而对杂志的政治方面关注太少。另外,该杂志缺少一个得力的工作班子,以至于兰克不得不亲自撰写大部分文章,而且,兰克在他的不少短篇文章中又没有很明确地表述他的历史哲学和政治观点,他通常只是在其历史学著作的边注中含蓄地阐述自己的理论根据。

在从事《历史-政治杂志》编辑工作的同时,兰克并没有停止他自己的历史学术研究:1833年,他创立了柏林专题研讨班(*Seminar*,又音译“席明纳”或“习明纳尔”),由此为历史学的持续发展

创立了一种典范性的教学机制。在专题研讨班里,他讲授自己以原始历史资料和客观事实为基础的历史学观点。从兰克的柏林专题研讨班里产生了许多重要的历史学家,他们在兰克身后继续在各自的教学和学术活动中传播兰克的历史理念。1834年,兰克被任命为正教授,同年出版了他的《教皇史》第一卷(共3卷,1834—1836年陆续出版)。这部书由于在认识论和史料评注方面的独创性而再次引起学术界的轰动。因为书中有一些反天主教的章节,在1841年被列入了禁书目录,其结果反而使得该书不仅在德国而且在德国以外的地方也引起了特别的重视。兰克于1839—1847年出版的6卷本《宗教改革时期的德意志史》(*Deutsche Geschichte im Reformationszeitalter*)同样也具有强烈的宗教信仰色彩。这部6卷的大书充分表明了兰克对于历史的百科全书式的综合概述能力。从兰克接着出版的《普鲁士史》(3卷,1847—1848)、《法国史》(5卷,1852—1861)和《英国史》(7卷,1859—1868)等一系列历史著作中,人们更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为撰写欧洲通史所做的努力,而这种努力在其未能全部完成的《世界史》(*Weltgeschichte*, 9卷, 1859—1868)计划中达到了顶峰。

《普鲁士史》一书最后部分涉及1848年的形势。当时在普鲁士如同在欧洲的大多数国家一样也发生了市民暴动和革命。兰克的一些自由派同事,例如约翰·古斯塔夫·德罗伊森(Johann Gustaf Droysen, 1808—1884)、弗里德里希·克里斯托夫·达尔曼(Friedrich Christoph Dahlmann, 1785—1860)都成了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然而保守的兰克和他们不同,他不主张为建立一个立宪基础上的统一德意志国家而斗争。对于市民暴动和革命,兰克原则上采取了拒绝的态度并称革命运动是“民众要求打倒一切的狂热”。1832年兰克被选为柏林科学院院士。1841年兰克被誉为“普鲁士国家历史学家”。这一荣誉称号意味着作为普鲁士君

主国拥护者的兰克被允许进入所有的国家档案馆,而其他历史学家则被拒之门外。1850年兰克被授予二级红鹰勋章,1855年被授予科学和艺术功勋勋章,1867年成为科学和艺术学院院长。自1854年起,兰克一直是普鲁士国务委员会委员。1865年兰克获得了可由子孙承袭的普鲁士贵族身份。从这时起,兰克一直佩戴着他的家族徽章,上面刻有他的座右铭“*labor ipse voluptas* [工作即快乐]”。在他离世前四年,兰克还最后获得了普鲁士枢密顾问的头衔。

兰克的学术成就不仅在普鲁士受到承认和敬重,其他地方的许多大学包括哥廷根大学和慕尼黑大学也都聘请他去讲学,对这些邀请他都一一婉拒,然而,他却接受了对历史颇感兴趣的巴伐利亚国王约瑟夫·马克西米利安二世(Maximilian II. Joseph, 1811—1864, 简称 König Max[马克斯国王])的邀请,为其进行私人讲座。讲座的内容在兰克身后于1888年发表成书,题目为“论近代历史的各个时代”(Über die Epochen der neueren Geschichte, 亦即中译本《历史上的各个时代》)。该书可以说是关于兰克历史认识论的方法和体系的最为简明扼要的论述。兰克自1835年起一直是慕尼黑巴伐利亚科学院的通讯院士,1853年他荣获了巴伐利亚君主授予的勋章。一年之后,即1854年,在马克西米利安二世位于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的别墅及其附近的威姆巴赫(Wimbach)狩猎之家,兰克为这位君主做了19次讲座,并且在讲座之后与其进行了讨论。兰克与巴伐利亚国王的会面很有意义,因为会面本身就说明了信仰新教的兰克同时也得到了来自天主教方面的尊重。另外,这位巴伐利亚国王还根据兰克的建议于1858年设立了“历史委员会”(Historische Kommission)。这个历史委员会至今仍然是德国大学以外的一所最为重要的历史学研究机构。直至1873年,兰克一直担任该委员会主席。

兰克从来都把他的职业生涯放在首位,其次才是私人生活。他的夫人克拉里萨(Clarissa,1808—1871)是爱尔兰首府都柏林警察局局长约翰·格雷夫斯(John Graves,1776—1835)的女儿。夫人的弟弟罗伯特·帕西瓦尔·格雷夫斯(Robert Perceval Graves,1810—1893)是英国利默里克(Limerick)圣公会主教。为了研究和搜集历史资料,兰克经常访问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档案馆。有一次兰克到法国进行研究工作,在巴黎结识了他的妻子。他们于1843年在英国北部的温德米尔(Windermere)结婚。婚后育有四个孩子:长子奥托(Otto,1844—1928),后来在柏林担任牧师;次子弗里都赫尔姆(Friduhelm,1847—1917),是位军人,军衔至普鲁士少将;唯一的女儿也许是出于父母对于巴伐利亚国王的崇敬被起名为马克西米利安娜(Maximiliane,1846—1922),她嫁给了普鲁士贵族、地产主威廉·冯·科策(Wilhelm von Kotze,1840—1901);最小的儿子阿尔布雷希特(Albrecht),1849年出生几个月之后就夭折了。兰克夫人的嫁妆十分可观,从而使得兰克能够在柏林过上超越他所从事研究工作收入的家庭生活,此外还让他拥有两万多册的私人学术藏书。这些书籍连同家具在兰克去世之后全部卖到了美国(现存锡拉丘斯大学)。兰克还从他擅长写作的夫人那里受到不少艺术启迪。兰克和夫人的天分由他们的子孙后代继承下来了,其中一位就是英国作家罗伯特·冯·兰克-格雷夫斯(Robert von Ranke-Graves,1895—1985)。

兰克人生的最后岁月是在疾病的阴影下度过的:1850年代,他的夫人受到渐渐恶化的脊髓病的痛苦折磨,靠轮椅代步。兰克在他夫人去世的1871年退休,此后集中精力出版他的《全集》(54卷,1867—1890年陆续出版)。这时候他几乎双目失明,曾多次跌倒而身受重伤。到生命的最后阶段,又渐渐失去了听力。1886年5月初,兰克在自己的住宅里最后一次摔倒,之后卧床不起。1886